

線上做組織的可能？

菲律賓社運青年的數位實作與游移之身

賴奕諭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
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綜觀菲律賓近代政治情勢發展，通訊和傳播媒體一直是不容忽視的社會運動媒介。然而，即便廣播與手機分別在1986年與2001年兩次人民力量革命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組織工作者卻對日漸成為菲國人民日常的社群媒體抱持著保留的態度，認為數位行動主義（digital activism）並未能真正取代傳統的組織動員型態，甚至主張社群媒體已經遭到國家暴力滲透，是人們散佈假消息與抹黑社運人士的重要途徑之一。本文從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菲律賓社運青年串連菲國本土與海外離散社群的組織動員行動為出發點，藉由線上與線下行動共同交織而成的數位民族誌，觀察他們鑲嵌於菲律賓歷史及政治脈絡之中的數位實作，並釐清他們對數位行動有所遲疑的緣由。而當人類學家同這些社運青年不斷於線上／線下、本土／海外之間游移之際，本文嘗試透過人與數位裝置及虛擬網絡所構築而成的關係網絡，指出數位行動主義所帶來的後人類政治（posthuman politics）視角。一方面，藉由釐清數位媒介、社群媒體與菲律賓人共同創造出來的社群性條件，以及人們基於該條件而發展出來的行動策略，本文強調數位民族誌的研究除了需要將線上、線下行動視為一個整體，更必須關切到人們選擇在社群媒體現身與隱身的邏輯與差別。另一方面，在藉由數位行動主義理解國家或社會的運作時，本文也主張不應忽略那些不斷穿梭於國界之間，或是原本不見得被視為一份子的（非人）參與者，它們都是能夠帶著研究者更進一步地理解不斷變遷中的政治定義與形式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數位行動主義，社群媒體，離散，後人類政治，菲律賓

一、前言

綜觀菲律賓近代政治情勢發展，通訊技術和傳播媒體一直都是不容忽視的社會運動媒介。1986年推翻馬可仕獨裁政權的人民力量革命，正是透過地下廣播電台不斷放送即時動態，號召數以萬計的民眾上街頭聲援將遭鎮壓的異議人士。至於菲國於2001年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則因為反對派陣營藉由手機發送上千萬封簡訊，不到半小時便動員上萬人聚集於馬尼拉街頭抗爭。即便如此，當社群媒體日漸成為菲國民眾的日常，不少組織工作者卻往往認為數位行動主義並無法取代傳統的組織動員型態，甚至主張社群媒體早已成為政府製造與推播假訊息的溫床。除了假訊息的疑慮，社運人士更擔心的是國家暴力於社群媒體的滲透、監控與打壓。就算並非真正有實際受壓迫的情況，許多立場敏感的組織或個人也往往會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因而形塑人們（不）使用社群媒體或是線上組織動員的行為模式。

我便曾經有過幾次經驗，是菲律賓的組織工作者特地傳訊息或當面找上門，要我別帶電子產品去見他們，以免遭到監聽的情形發生。倘若真有必要得帶著手機，他們也希望我能夠先行關機，並放在一定距離以外的地方。電子產品之外，有些人則會強調盡量不要使用一般人所熟悉的臉書訊息（messenger）等軟體，並建議我下載特定加密社群軟體與他們收發訊息，以確保傳遞的消息不外洩，保障傳送訊息的雙方都得以安全無虞。

這類情況在2020年6月菲國眾議院三讀通過「反恐怖主義法」（Anti-Terrorism Bill）後變得更加明顯且頻繁。在新法案的內文中，所謂的恐怖份子不只侷限於破壞私有財產、公共設施或有傷害人意圖的犯罪者，公開示威的異議人士也可能被包括在內。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恐怖份子，該法案甚至明定人民不得捐贈金錢及物資給國家不予承認的組織。任何人發佈、撰寫、分享甚至轉推的貼文（包含迷因圖），只要被軍警認定與恐怖份子、組織相關，都有可能「被觸法」。有鑒於法案通過的當下，正是大多數活動都被迫轉往線上行動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菲國政府此般舉措無疑造成不少異議人士恐慌，就連旅居海外的菲律賓移工及離散社群都有感受到這股壓力。

異議人士的恐懼心理及其相應受影響的行為，並非是在「反恐怖主義法」發佈之後才有的現象。早從我還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科地雷拉（Cordillera）地區進行碩士論文的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田野調查期間（2014至2017年），便曾聽聞不少異議人士已有過許多在社群媒體遭到騷擾或抹黑的經驗，而這些經驗也都往往會進一步影響他們使用網路與社群媒體的想法與實際作為。也因此，有些人便會在社群媒體改名，或是刻意抹去自己的個人資訊與相片，以免遭有心人士拿去惡意使用。不只是如此，網路上的負面攻擊手段甚至還會與手機簡訊等通訊和傳播媒體相結合，不僅是在較為傳統或規模較小的社區有相當顯著的效果，就連對於公眾人物的討論，或是更大規模的地方或全國選舉都會有所影響。舉例來說，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曾因為其以記者身份槓上前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Roa Duterte），成為在菲律賓受到網路負面攻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這樣的現象在菲律賓有其歷史淵源，也與該國既存的暴力議題有直接關聯。菲國政府多年來以國家安全為名，主張必須由非常手段打擊國內目前仍持續存在的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及激進的穆斯林武裝組織。許多其他政治路線的異議型組織或個人往往因此成為遭到標籤且打擊的目標。不少批評政府此般作為的聲音認為，政府其實是用這樣的方式，將一直以來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暴力統治合法化，打擊所有與他們意見不合的聲音，並恫嚇可能有意提出異議的民眾。有些人甚至主張，這些作法主要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維繫政客個人的政治或經濟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群媒體的展演與公開性質使其成為國家展示權力、異議人士表現抵抗力量不可或缺的平台。這與菲律賓本來就高度具展演性質的政治風格和文化不謀而合，兩者相輔相成，並且互相成為支持彼此蓬勃發展的重要條件。也因此，社群媒體不僅逐漸成為討論菲律賓近代政治難以忽略的面向，同時也讓異議人士認為社群媒體是個應當認真耕耘的戰場。然而，他們卻又憂心依賴社群媒體，將可能加重國家機器所帶來的壓力，不利於他們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工作。

做為一個研究菲律賓社會運動的政治人類學家，本來因為過去報導人對於數位行動主義的疑慮，而跟著他們偏重於關注線下實體的組織活動。不過當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以來席捲全球，菲律賓組織工作者與身為人類學家的我都同樣被困在家中，被迫只能夠以網路與世界連結之時，我們都不得不重新檢視過去很少被認真討論的線上組織工作之可能性。

於是在2020年4月至2023年5月的這段期間，我開始透過數位民族誌的研究方法，重新檢視我在當時所接觸到的菲律賓社運青年。我也在過程中漸漸意識到，得以透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形塑出來的特殊條件，將菲律賓社運青年在那段時期的線上行動實踐，用以對比其於疫情前後對線上組織動員的態度與作為。研究期間，我以成立於夏威夷的菲律賓青年倡議社團「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Anakbayan Hawai'i）為主要的觀察對象。雖然該組織位於菲律賓境外，起初主要由遠赴海外求學的菲律賓青年所組成，但隨著組織的發展，也有越來越多的菲裔美國人加入。這樣的組成特點及他們所關注的政治議題和行動，與菲律賓國內的政治情勢和脈動緊密地連動著，使其不該被單純視為是離散社群針對海外菲裔移民而組織的社運團體。

過程中，研究者同時扮演參與者與研究者的角色。一方面，我在疫情之前便已經開始參與到「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活動，後來進而於疫情期間成為該組織的幹部之一。因此，我得以用局內人的身份和他們一同思考該如何凝聚成員、持續社團的組織動員行動，甚至串連美國、夏威夷及菲律賓本土的其他相關組織。另一方面，做為一個人類學家，我也因為這樣的條件意識到數位實作之於一位組織工作者的意義，確實是我以往在研究上所忽略的面向。特別是當疫情趨緩，大眾又逐漸回復到「正常」的生活後，這些組織工作者很快地回到原先實體的聚會與行動模式，我在這樣的對比中關注到連組織工作者都可能因為太過習以為常，而往往視而不見的日常數位實作。

文章首先想要釐清的問題是：這些菲律賓青年對於社會運動的想像是什麼？因為疫情迫使他們一度必須將行動幾乎全數轉往線上之後，這和他們原先對於社運的理解又有什麼樣的差別？當數位行動主義在世界各地儼然已經成為是一種新型態的社會運動形式，菲律賓的社會脈絡與條件，又是如何影響散佈於世界各地的菲律賓社運青年，他們採取何種姿態看待這種形式以及相應的行為模式？做為一個研究者，透過數位民族誌的調查與書寫，在將行動者放入到其與數位裝置及虛擬網絡所構築而成的關係網絡之後，又如何能夠擺脫過

去研究人們線下實體行動可能的侷限，更具體的理解行動者及其數位行動所帶來的效果？

藉由前述的討論，可以見到菲律賓社運青年對數位行動的遲疑態度，似乎是導因於該國社運及暴力統治的歷史發展脈絡。不過這樣的觀點卻也讓數位行動所面對的挑戰，彷彿只不過是政府和社運人士於線下的行動與對立之延伸。藉由線上與線下、本土與海外的行動共同生成的數位民族誌，本文主張這樣的解釋方式是過度以人的意識為中心的觀點，將讓我們忽略數位技術已經透過不同力量鑲嵌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因為就連菲律賓的社運人士自己本身，縱使深受數位技術影響，卻也不見得會很清楚的意識到這些實作的意義，還有它們所隱含的政治意義。在這個研究假設的基礎上，本研究強調在理解菲律賓的數位行動主義之前，必須先釐清社群媒體與菲律賓人所共構而成的社群性。在了解這種社群性對菲律賓人及其社會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之後，才能夠再回過頭來重新思考菲律賓人在數位行動主義所遭逢的困難究竟有何意義。

二、數位行動主義與後人類政治的觀點

本文將菲律賓社運青年的數位實作放在兩種類型的文獻脈絡之下討論，分別是數位行動主義研究以及人機互動中的後人類政治意涵。首先，數位行動主義通常被視為是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型態，藉由網路及數位媒介動員群眾、發起政治行動。在數位媒介與裝置在世界各地變得普及以後，這類型的社會運動因為較傳統政治動員成本低，又得以在短時間內跨越地域串連群眾，不僅成為越來越多人表達意見、參與政治的一種途徑，它也促成了像是阿拉伯之春等世界著名的抗爭行動。也因此，學者開始關心數位行動主義到底是什麼樣新的政治參與形式，而它又如何具體地改變社會運動的型態。尤其當社群媒體在近年來成為幾乎是所有人生活的日常，它在形塑當代社會的民主與公共領域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現代的人們似乎都很難避免不談的問題。

（一）數位行動主義研究的反思

以菲律賓的相關研究來說，研究者多半是由數位行動主義的發起者，或是從社運人士所欲動員的群體做為出發角度，探究數位行動主義能夠為社會

運動帶來什麼新的可能性。以離散社群為例，菲律賓因其殖民歷史和國家政策鼓勵的因素，許多人選擇遠赴海外工作和生活，並透過通訊技術和社群媒體將海內外的親友網絡連結在一起。雖然最初人們使用數位媒介的目的並不一定是政治相關的，但因此而形成的跨地域政治行動一直是菲律賓重要的當代議題。尤其是許多菲裔移民、工人或互惠生（Au Pairs）常常處於缺乏法律保護的情況，生活和工作環境不理想，也少有身體、情感或契約上的安全保障。透過數位行動主義的跨地域串連，這些人得以創造與現實存在著共生關係的政治空間（Dalgas 2016; McKay 2019），甚至進一步促成和其他亞洲國家移民、移工社群共同的跨國團結網絡（Law 2003; Sales 2019）。於是就在菲國移工政策與全球勞工鏈的相互影響之下，這類型的議題在菲律賓討論數位行動主義的時候就很容易先受到矚目。

另一方面，數位行動主義與菲律賓青年之間的關係往往也是研究的焦點，因為他們多半被視為是熟稔於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原生使用者，也被預設為數位行動主義的主要實踐者。不過也因為如此，數位行動與傳統政治動員的優劣比較，在某種程度上被形塑成是世代的問題：有些人便會批評，受到社群媒體娛樂與消費氛圍的影響，多數的年輕人對政治參與可能沒有太大的興趣。而就算是那些熱衷於政治、社會議題的菲律賓青年，他們在網路上的行動不僅多半被視為是比較消極的作為，同時也被認為不若過去社運前輩面對面的組織動員行動那麼有實際的政治力量和效果（Arguelles 2020; David 2013; Lanuza 2015; Marcaida 2020）。

將數位行動主義的發展定調為世代差異的問題之外，菲國社會近年來頗受關注的假資訊、假新聞基礎設施研究，則是將議題的焦點放在政府與社運人士間的對立是如何由線下的政治場域延伸至線上空間。致力於研究菲律賓假資訊、假新聞基礎設施的Ong和Cabañes（2019: 5778-5780）便表示，有許多政治人物開始會雇用專業的廣告公關公司從業人員及個體戶的數位工作者，藉此生產得以操作選舉、輿論的社群媒體內容，更讓假資訊及假新聞的生產更穩定的產業化。在他們看來，這些假資訊和假新聞的傳播對於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因為它們可能干擾並限制了社會運動在數位平台上的有效傳播和影響力。同時，也有學者主張這些假資訊和假新聞也讓我們更

進一步理解權力關係在菲律賓社會的競逐如何從現實生活延伸至數位虛擬空間（Combinido and Curato 2021; Estella 2021）。政治人物和組織利用社群媒體和數位平台來塑造和操縱輿論，進而影響公眾對特定議題的看法和態度。這種權力的競爭在數位世界中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數位行動主義者不僅在現實生活中掌握運動的方向，同時也要在數位虛擬空間中保持警覺，以應對這些具有權力影響的虛假資訊。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菲律賓的研究以外，媒介與科技技術被一些學者視為是討論數位行動主義研究不能夠輕易忽略的面向。Manuel Castells（2015: 248-252）從「網絡社會」（networked society）的概念出發，主張藉由網路科技發展而來的人際網絡，能夠創造出平行、自主、多重方向且更具互動性的溝通模式。他認為透過網際網路邏輯的串連基礎，結合既有的社會網絡和線下的行動模式，可以塑造出新興社會運動的型態。Pritha Prasad（2016: 52）以類似的概念研究黑人社群和數位行動主義，強調數位媒介的資訊散佈機制可以突破以人為中心的既存權力結構限制，使特定人群的困境與發聲能力更有機會在社群媒體平台上被看見，進而促成線上和線下運動結盟的可能性。如此看來，這些研究聚焦於數位行動主義的技術面向，呼應了Jennifer Earl及Katrina Kimport（2011: 32）對於數位技術如何促成社會改變的研究。他們關注社會運動如何透過網路的「科技能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開發有別於以往的運動策略，藉此降低成本、促進大眾於異時異地的參與，進而改變抗爭的邏輯。除此之外，這些研究更指出了「數位」行動主義不只侷限於在線上進行的行動，更多時候是線上和線下行動混合或相互影響的組織運動模式。

然而，也有研究對前述的取向提出了批評，主張社群媒體的技術並不必然導向社會變革。Dustin Kidd和Keith McIntosh對社群媒體和社會運動的關係提出樂觀、悲觀和矛盾的不同觀點，探究社群媒體是否能夠成為引發社會運動成功的轉捩點。對他們而言，前述的學者——如Castells——往往過於樂觀地相信社群媒體帶來了另一種形式的溝通邏輯，認為這樣的溝通邏輯使得社群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同時低估既存權力結構可能同樣會運用該技術再生產既有的權力不對等關係（2016: 792）。因此，除了憑藉技術而形塑出來的網絡之外，人在這個形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必須同時被納入

考量。舉例來說，Paolo Gerbaudo (2012: 5) 主張社群媒體得以藉由平台管理者和組織工作者各自的「集會編排」(choreography of assembly)，引導高度分散且個體化的支持者集結，並打造公共空間。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編排者」(choreographer) 參與場景的設定、建構情感的空間，讓集體行動得以展開。有鑑於此，研究網絡社會溝通的邏輯和串連的方式時，不再只是侷限於技術層面的議題，同時還需要關注行動者透過社群媒體做了什麼，包括如何引導和建構溝通媒介，並促成集體行動的空間。這樣的研究不僅執著於社群媒體對社會運動是否有幫助，更著重於行動者如何運用社群媒體，以及其所採取的具體行動。

本研究在回顧數位行動主義的研究文獻之後，注意到菲律賓的相關研究很可能過於強調以人的意識為中心的觀點，反而忽略了科技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些文獻回顧也告訴我們，研究不該偏廢於技術層面的討論，行動者在其中的能動性與參與過程也同樣是影響數位行動主義發展的關鍵面向。也因此，本研究也嘗試要從人類學與後人類政治研究的文獻中得到靈感來源，找到更適宜的框架去理解菲律賓社運青年的數位實踐。

(二) 人機互動中的後人類政治

回到人類學研究這個議題的脈絡來看，早在1990年代便已經有人類學者主張以民族誌方法探究由人類與機器互動而產生的文化現象，試圖釐清機器究竟是如何介入到人的日常生活與其社會關係(Downey, Dumit, and Williams 1995: 267)。例如，Horst和Miller (2012: 108) 在他們的研究中以人類學家Terence Turner為例，解釋了他在1992年出版的作品中，如何探究南美亞馬孫地區的原住民族卡亞波(Kayapo)使用影片拍攝來揭露外來者對當地的入侵情況，進而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這樣的例子顯示人們運用新技術適應變化與挑戰的主動能力；與此同時，人類學也不再只偏重於過去關注的慣習和傳統研究，還更積極地探索技術與人之間的互動如何帶來社會變遷的可能性。以本文所關注的數位行動主義為例，由於數位基礎設施和技術、中介性、數位內容以及數位環境的物質性得以改變使用者的行動與習慣，數位媒體和技術不會單純只是反映出人類的意圖。簡言之，它們在建構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的過程中，

同時也創造或強化人們運用這些技術的文化和能力（Horst and Miller 2012; Juris 2012; Lim 2014）。

Alan Smart和Josephine Smart（2017: 95）從後人類（posthuman）的觀點出發，認為人類一直以來都是透過與技術和周遭環境等非人（more-than-human）的互動和整合來塑造自身的身體和生活條件，這樣的現象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把這樣的觀點放在政治的領域來看，政治哲學家Jane Bennett（2010: 36-38）以「物力」（power of things）的概念，強調透過人與物的互動關係來理解政治的生成和運作。他主張非人所產生的政治效果不能簡單歸因於人類主體性，因為各個行動者的能動性（agency）可能也只是組裝（assemble）之後呈現出來的結果。有鑑於此，非人的行動者及其行動將得以提供一個反思甚至挑戰的契機，讓人們思考何謂政治、民主以及公共場域如何形成，而過程中又有哪些（不）被當作是政治行動與政治行動者。如此看來，數位行動主義的演進和發展不該被視為只是單純人類的政治行動，而演算法、數位裝置與虛擬網路等非人的行動者也不該被當作只是純粹脈絡、阻礙或工具，因為異質元素組裝的過程將可能帶來不同的政治效果，而能動性可能也只是組裝之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本文受後人類觀點的啟發不止於此。當後人類學者藉由非人的存在與介入探究人類實際上的面貌及其「形成過程」（process of becoming），其實也同時在挑戰西方人文主義影響之下「人」（Man）的概念。簡單來說，「人」的概念強調人類的理性、自我意識、道德和智慧，不僅將人類與其他生物和環境給區分開來，背後更是以西方、白人和男性的視角預設了「人」該是如何的存在。然而，後人類觀點的出現挑戰這種對「人」的傳統定義，除了指出過去往往被視為是少數或他者的群體是如何遭排除在外，也強調非人元素在塑造人類存在和身份中的重要性。在哲學家Rosi Braidotti（2016: 37）看來，後人類的觀點並不意味著人類的存在將陷入危機，反而更有機會能夠擺脫以人為中心的框架限制，探索更多人可以是什麼的可能性。基於這樣的討論基礎，Stefanie Fishel認為後人類的觀點甚至有助於重新評估現代國家的概念。因為在西方的傳統認知下，國家常被比喻為一個身體，由所有人民組成，而其存在則源於人們對於公民政府的需求（Fishel 2017: 29-31）。然而，現代科學揭示人類身體

功能的運作，同樣受到不直接屬於身體的微生物組（microbiome）、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es）及其他共生夥伴的支持。這也似乎顯示，我們在理解國家或社會的運作時，不應忽略那些不斷穿梭於國界之間，或是原本不見得被視為「身體」一部分的參與者（同上引：101-103）。

對本研究而言，不斷在世界各地移動的菲律賓人以及透過技術與裝置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的數位實作，都一直在不斷挑戰過去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政治秩序和行動的可能。而後人類的觀點正是在提醒我們，藉由數位行動主義理解菲律賓政治的時候，不該輕易地受到既存的國家邊界和「人類」的概念給侷限住。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本文接下來將透過數位民族誌的書寫，探究由數位中介而構成的社會關係是在什麼樣的脈絡成為可能，而國家與社運人士不同型態的權力又如何能在數位技術、數位裝置及其基礎設施所搭建的框架下運作。這些關切的面向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數位內容及相應的實作在所述的情況下產生什麼樣的政治效果，又是如何回過頭來具體地影響社會關係。這也才得以使我們理解數位民族誌將如何能夠作為一種方法，重新反思過往對政治和行動主義的認識與相關研究。

三、本土／海外、線下／線上的社運實作

2020年初，我透過在夏威夷的學校老師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信裡提到來自菲國南部民答那峨（Mindanao）的原住民族婦女組織「薩博卡漢」（Sabokahan，該詞彙在菲律賓語有團結、合作之意）預計將在美國有個巡迴代表團，希望從事菲律賓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研究的我，能夠協助他們在夏威夷舉辦的活動。像是這種菲律賓倡議組織的代表團，過去在美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除了推廣議題與創造團結交流的機會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向大眾募款，用以資助國內的組織工作運作。尤其美國有為數眾多的菲律賓裔移民與相關組織，他們往往透過與在地社團的串連達成其目標。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蔓延全世界後，代表團行程從不斷地往後推遲，最後在八月改以線上講座的方式進行。

在同年年初，幾位來自菲律賓的學生在夏威夷大學校園裡舉辦了青年倡議組織「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成立大會。「人民之子」最初起源於1990年代末期的菲律賓，是該國異議人士在面對左翼勢力路線分歧與分裂之際所成立的青年組織。2000年初期，在美菲人抗議美、菲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以反恐為由的軍事結盟以及在菲律賓南部的軍事部署，因而在西雅圖成立了美國的第一個分會。自此「人民之子」便在美國各大城市遍地開花。雖然係出菲律賓，三十多個在美分會卻是由美國的總會所統領，除響應菲國本土的組織與議題之外，更強調應當要把菲裔移民在美國社會的處境連同前者，一起放在殖民、帝國主義的結構性框架去理解。

然而，最初籌辦夏威夷分會的幾個核心成員，是自菲律賓赴夏威夷讀書的學生。有些人在菲律賓時，就有參與社運組織或抗爭行動的經驗；有人則是遠赴海外求學之後才開始關注到菲國的社會議題，而加入這個倡議組織。除此之外，組織成員還包括有跟著父母或親友移居美國的新移民，有些人甚至還正在等待取得公民身份的階段，或多或少都還有些許在菲律賓生活的經驗與人際網絡的連結。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菲律賓裔成員也大有人在，其中包括有些混血的成員。少部分成員雖然是沒有菲律賓血緣的亞裔美國人，卻是因為其他亞裔社群的倡議組織而連結過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之子」多半不是成員們唯一在美國、夏威夷或菲律賓交好或是加入的組織。有些人原本就是工會、夏威夷勞工中心（Hawaii Workers Center）或菲律賓夏威夷人權委員會（Hawaii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Philippines）的成員。也有人並非參與以菲律賓人為主的組織，反倒是同時也加入到學生工會、原住民族權利倡議社團、反美軍基地跨島嶼聯盟或泛太平洋島民的組織。人們各自迥異的興趣、背景以及生命遷徙路徑都為這個組織帶來不同面向的討論與團結政治的多樣連結可能性，讓「人民之子」這個菲律賓組織在離開了菲律賓本土並移植至美國與夏威夷之後，藉由不同地方分會各自的發展使其有了更為廣泛且複雜的面貌。

即便是如此多元的組成，「人民之子」透過其運作型態，仍舊提供了參與者對於「社會運動」或是「菲律賓的社會運動」相對具體的想像。這種想像源自於「人民之子」襲自菲律賓左翼政治聯盟的階序化組織架構，以及他們在組

織內部教育討論的形式與內容。簡單來說，美國總會定期統整菲律賓本土發生的最新情勢，並統合美國各分會在地實際面對的議題，再以聲明稿及行動綱領等方式，讓各分會得以有具體的組織工作依據。這樣的作法讓即便是參與美國分會的成員，也都不至於與菲律賓社會的脈動脫節。

藉由時下議題與殖民、帝國主義框架串連起美菲之間的組織與社運青年外，「人民之子」的「國家民主學校」（The Pambansa Demokratikong Paaralan，簡稱PADEPA）藉由設計教育討論的課程大綱，確保各分會組織成員對於抗爭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認知（Anakbayan-USA NEC 2021: 1）。雖然各分會可以依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甚至自行統整、書寫討論素材，但所有進入到「人民之子」的成員，基本上都會閱讀到下列兩部作品：分別是 *Philippine Society and Revolution*（《菲律賓社會與革命》，簡稱PSR）以及 *Activist Study: Araling Aktibista*（《社會運動者的課題》，簡稱ARAK，中譯名為作者自行翻譯）。而2020年才正式成立的夏威夷分會，每一年也都會針對新加入的成員，重新再安排這兩本著作的教育討論。我從2020年至2023年開始參與到每期的教育討論。除了藉此認識到不同的新成員如何解讀這些文本，也得以在每一年的教育討論中看見內容安排與討論過程的強調重點。

《菲律賓社會與革命》一書，是菲律賓共產黨創辦人Jose Maria Sison於1971年以Amado Guerrero為名所書寫的作品，該書至今仍被許多菲國左翼運動者奉為理解抗爭策略與菲律賓社會特性的重要基礎。貫穿此書的主軸是菲律賓歷史與歷年來的抗爭，寫作者希望藉由歷史經驗，讓讀者理解到自己正承接著的是參與抗爭先人的使命，年輕人亦可藉由過去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來調整自己的運動策略。討論完《菲律賓社會與革命》一書後，組織成員通常會再讀《社會運動者的課題》。據傳該書集結了毛澤東於1929至1945年間所寫的文章，這是因為菲律賓共產黨自詡承襲了毛派的革命路線。其中一篇來自於毛澤東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詞，以「愚公移山」的寓言為引子，主張運動者應當要發展共同的信念：縱使過程相當艱苦，也要相信大眾終將能覺醒，而他們一定在最後與運動者一同並肩作戰。

兩本作品成書的年代雖然都距離現在有些遙遠，但它們在描繪菲律賓歷來抗爭者艱辛與忍辱負重的形象上，卻部分呼應了菲律賓當代左派抗爭者在組

織動員方面所面臨的困境。以菲律賓本土的情況來說，左派經歷了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後的派系分裂與出走，加上不少人憂心宣稱走合法運動路線的運動者，與仍堅持地下武裝路線的新人民軍可能還有所牽連，都使其勢力與組織動員能量已經大不如前。而根據夏威夷分會內部成員的交流，在討論這兩本書的時候，有個會不時地重新被拿出來討論的議題，而這個議題也往往被認為與前述的抗爭者形象相互呼應：不少參與者不約而同地表示，大多遷居至海外的菲律賓人可能認為，自己已經離開母國追尋更好的生活，基本上不太願意再涉入到菲律賓國內政治問題，特別是本來立場就比較敏感的一些組織行動。這些人的態度往往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想要投入社會運動的親友或同儕。

最顯著的其中一個例子，是不少「人民之子」成員也同樣為夏威夷大學其他菲律賓學生社團的成員，包含成員以塔加洛（Tagalog）後裔為主的「民族團結協會」（Katipunan）和以伊洛卡諾（Ilokano）後裔為主的「同心互助會」（Timpuyog）。由於這兩個社團主要是透過語言學習所構成的學生團體，當這些人有幾次嘗試透過那些社團推廣「人民之子」的活動時，往往就被組織的幹部以過於「政治」為理由而拒絕。在有過數次這樣的互動過程之後，組織成員妍森曾在2023年同時擔任「人民之子」和「民族團結協會」的幹部，她便試圖透過這樣的身份要打破這個僵局。於是，她最後在「民族團結協會」籌辦的一系列工作坊中，提議了一個「人民之子」的講座。該講座的目的是要教導參與者認識菲律賓本土的社會運動有哪些著名的抗議口號。而為了要避免有些人認為這過於政治化，妍森強調這是一種藉由過去菲律賓的歷史學習語言和文化的途徑。這樣的說法經過了一番的討論和調整，最後的提案在看起來其實相當模稜兩可的邊緣立場下通過。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嘗試都像是這個例子如此幸運，因為部分成員甚至連跟親友解釋為何自己要參加這樣的組織都不是很順利。戴爾是在疫情期間加入「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大學生成員。他在最初是因為疫情所帶給他的焦慮感，參與到一個位於加州的菲律賓裔社群寫作會。雖然該組織在當時的計畫是嘗試於線上出版他們的書寫作品，戴爾還是覺得身處夏威夷的他跟這個組織的人離得實在太遠，而這便成了他加入「人民之子」的契機。他甚至在剛開始還算是活躍的那段期間，希望能夠促成「人民之子」成員的書寫讓線上刊物

刊出的機會。然而，當戴爾的父母透過親戚得知兒子在臉書上發佈的組織動態消息，立刻要求他斷絕所有跟組織的關係，否則將不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面對這樣的情況，戴爾最後決定透過臉書私訊向當時「人民之子」的幹部一一解釋，最後直接刪去原先所有與組織聯繫的社群媒體帳號，改以匿名小號低調的參與。

如此看來，從事組織工作顯然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不過藉由實際上的組織工作、活動推廣，以及讀書會的交流分享，成員們將自己的處境和菲律賓抗爭者的生命經驗更具體地連結了起來，也有互相激勵彼此信念的效果。像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的2020年，一名密克羅尼西亞與菲律賓混血的成員羅倫斯便在一次讀書會中表示：過去主要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島民權益組織做倡議工作的他，藉由讀書會討論菲律賓的過去而受益良多，因為「菲律賓人不斷抵抗殖民主義的歷史，讓我非常驕傲於自己是個菲律賓人。」除此之外，有部分成員在疫情前或疫情趨緩後曾拜訪菲律賓，甚至有機會接觸到菲國本土運動者，當他們將這些經驗也同樣帶到讀書會或組織的聚會分享時，書裡菲律賓的抗爭歷史與當代的運動便更加具體地結合在一塊。參與成員藉由這些過程，感受到自己正接下過往抗爭者所傳來的棒子，努力要達成在菲律賓本土尚未完成的革命。

線上的社運實作在此過程中自然是不容忽視的面向，它不僅串連起菲律賓本土不同地區之間的組織網絡，更使得組織工作者將觸角延伸至海外的菲律賓社群。Joy Sales (2019) 主張數位行動主義是提供菲律賓大眾另類教育的重要管道，因為它能夠藉由社群媒體等媒介使得倡議素材跨越國界的侷限、快速地於網路上流通。此般行動所帶來的成果不僅挑戰本來由國家所主導的歷史敘事，更同時撐出新空間提供遭噤聲或邊緣化的群體發聲。早在疫情發生之前，「人民之子」的成員就已經是透過社群媒體、電子郵件寄送的電子報以及組織提供的雲端圖書館等途徑，彼此交流各自關切的議題與閱讀的素材。而前面所提到的「國家民主學校」，就是藉由雲端資料夾試圖提供系統化的知識地圖，希望各分會得以藉由這種線上的策展更輕易地理解組織所欲推廣的議題。有些分會，像是芝加哥分會，還特地重新整理出他們為了《菲律賓社會與革命》所製作的教案，內容包含他們如何設計引導的討論問題，還有針對每個章節可以

有哪些補充材料，而這樣的一份資料就直接被上傳在「人民之子」總會所提供的教育討論雲端資源中。

即便有線上的資源分享，不少菲律賓社運青年也強調，這種數位行動主義頂多只能夠促進運動達成目的，卻無法完全取代實體的組織動員行動。也因此，透過社群媒體的發文、話題標記（hashtag）等參與方式固然是彼此串連、響應和互相學習的重要途徑，組織成員也往往會接著討論該如何同時發展出相應的實體活動。在教育討論的讀書會時，帶領的幹部往往會要求參與者唸出簡報上的字句，或是事先分配參與者各自帶領討論，目的就是要確保大家真的有讀進去，才能夠在進一步的交流中有共同的認知以及更明確的效果。這件事在疫情期間尤以重要，因為參與者其實很容易看似有參加，但卻不見得有真的參與於討論之中。

當菲律賓的社運人士強調對於國家與資本力量的擔憂使得他們對於數位行動主義持有保留態度，社群媒體上組織間的相互呼應和資料共享的數位實作顯示了數位行動在形塑這種跨地域政治組織的網絡時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線上與線下混合式的行動模式往往使人忽略了數位行動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會有人不斷藉由菲律賓過往的抗爭經驗強調實際上人與人的連結與組織動員行動才是根本。然而，當他們在2020年遭逢席捲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後，他們被迫思考該如何將組織動員工作轉往線上，而他們對於數位行動主義的忽視與憂慮，也將如影隨形地持續在過程中不斷現形。

四、疫情中（被迫）的數位實作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參與「人民之子」的這些社運青年已經在使用數位媒介進行溝通、儲存資訊與運動串連等組織工作。如此一來，但這和疫情之後的數位實作又有著什麼樣的不同？而當原先為線下實體的活動轉為線上行動以後，他們又是怎麼看待被迫轉變的行動模式呢？

疫情造就了一個相當特殊的時期，畢竟，當面對面的互動幾乎全都必須藉由數位媒介作為中介才成為可能。有些組織成員便抱怨，當學習、工作、社團、社交等所有一切的活動都往往是以線上視訊的方式在進行的時候，他們感

覺做所有的事情不僅都很相像，其所耗費的能量也感覺差不多。「人民之子」基本上也陷入這樣的困境。就在疫情開始限制一般民眾除了必要活動之外不能輕易離開住所之後，幹部們先是透過視訊軟體Zoom舉辦定期會議，以確保四散於各處的成員都能夠繼續參與組織活動。然而，大家很快就發現參加的人數每況愈下，因為組織成員似乎開始對於永無止境的「線上會議」越來越不感興趣。面對這樣的情況，社運工作者該怎麼如往常一般的做組織動員工作？而重點是要觀察人與人之間互動交流的人類學家，又該如何打破本來對於田野調查的想像，在這樣特殊的時期進行田野的觀察？

（一）組織內部的聯繫與培力

組織首先面對的難題是內部的關係維繫。這裡的關係維繫不僅僅是針對原先就已經加入組織的成員，同時還包括在疫情期間來詢問的人或直接加入的新成員。根據在疫情趨緩之後於加州舉辦的2023年「人民之子」全美大會，「人民之子」的成員數量於疫情期間有極為明顯的成長，也有好幾個新分會甚至就是在疫情之中成立。會議主席強調，這是因為很多人在疫情之中感受到各種壓力，想望找尋情感的寄託。而「人民之子」這個具有族裔和文化色彩，同時又強調政治倡議重要性的組織，便成了部分非裔美國人的選擇之一。即便是這樣，夏威夷分會在內部關係維繫所面對到的挑戰卻沒有比較少。尤其許多新加入的成員就算在一開始興致勃勃，卻也往往很快地就再也不出現。

雖然說「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在成立沒多久之後便遇上了疫情，他們主要還是參照其他分會過往的日常運作模式。在疫情之前，組織成員的互動交流通常建立在每個月一次的成員大會、兩個月兩次的教育討論，以及不定期舉辦的活動論壇或抗議與聲援行動。疫情之後，除了原先對外界做倡議、宣傳以及跨組織或地域串連的臉書、推特與Instagram專頁之外，組織幹部不斷嘗試各種類型的媒介平台，希望在不同性質的線上軟體相互搭配使用以後，所有成員都可以藉此比較有參與感，也期望得以因此找回到人們較熟悉的面對面交流互動的感覺。

為了讓成員們理解組織內部的分工，並隨時得以掌握彼此的工作進度，幹部在疫情之初先是使用Slack平台。雖然說本來使用的臉書訊息或是手機簡

訊也能夠做為組織內部的溝通聯繫的媒介，但幹部藉由在Slack創立不同頻道（channel）讓不同性質的任務可以藉由頻道的分別有更為明確的區分，成員也不需要等到會議才得以掌握組織內部不同任務各自的工作進度為何。幹部們認為透過像這樣的方式，原先不見得隸屬於特定分工或任務的成員也能夠依據自己的偏好，找到自己在組織內部的定位。

然而，即便希望透過新平台讓組織成員可以在例行會議與教育討論之外更有參與感，實際上最後的效果卻並不如預期的好。不少人還是習慣於使用原先的臉書訊息及手機簡訊。即便幹部們嘗試在Slack平台上拋出話題，基本上大家都還是在臉書訊息跳出來的時候比較熱絡些。有鑑於此，幹部之中有人便提議改用Discord這個新平台來取代Slack。雖然說Discord在許多功能上都與Slack有些相似，包括頻道設立、文件共享等功能，提議者主張習慣使用Discord的年齡層更低，或許較能夠鼓勵校園裡的年輕成員加入對話與協作。更重要的是，提議者嘗試使用Discord即時、分群語音聊天功能，用以解決人們厭倦視訊或打字的問題。

一個與改換平台無關的改變，是提議者搭建在Discord的新平台時，順帶增加了「社區活動」、「菲律賓新聞」、「夏威夷新聞」、「美國新聞」與「國際新聞」這五個新頻道。這項改變值得一提的原因在於：「人民之子」這個組織的宗旨除了招募並凝聚對社會議題與社會運動感興趣的青年之外，也試圖透過「政治教育」提供參與者對於運動實踐的想法與實踐方向。前面提到例行的教育討論是一種方式，疫情之前的組織往往還透過實際上發起倡議、抗議行動或是加入聲援其他運動組織的活動做為另一種教育的手段。由於疫情之後這類的行動往往轉變為只有在社群媒體上話題標記與影音挑戰的響應，而多數人往往只會透過按讚、分享作為行動的方式。也因此，組織幹部便開始想要藉由時事新聞與議題的討論，來彌補政治行動全面線上化的不足。

可惜的是，Discord的平台在搭建完成之後並沒有辦法獲得多數組織成員的青睞。不少人表示，他們可以理解這些嘗試是為了要改善並促進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模式，不過他們也已經開始厭倦不斷地在轉換並適應新的平台。有些人要不是拖到很晚才下載，不然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打算要使用它的意思。也由於這些實體轉線上的過程讓多數人覺得太過疲憊，他們在疫情趨緩之後，很快地

就直接放棄使用這些平台，繼續回到本來面對面實體交流的互動模式。

組織內部維繫所遭逢的難題跟不同平台的使用經驗相關嗎？對妍森來說，這個問題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原因是不到二十歲且在美國本土出生、長大的她，很明顯的直接與「人民之子」的幹部有年齡差距和使用社群媒體習慣的差異。特別當菲律賓本土來的人往往都認為使用臉書是件習以為常的事情，大學一年級便選擇加入「人民之子」的妍森卻根本沒有在使用臉書，她甚至是在加入組織之後才特別去下載了臉書訊息的應用程式。據她表示，疫情期間針對使用不同媒介平台的討論雖然有稍微觸及到先前困擾著她的問題，但組織裡頭的大多數人都還是習慣用自己平常就在使用的社群平台，使得這樣的討論似乎最後就有點不了了之。這樣的結果導致的後果，是幾次幹部需要聯繫她商討組織工作事宜之時，都還得特地傳個人的簡訊才真正聯絡得到她。

相較之下，也有些人的經驗與是否更換平台無關，而是他們在加入組織之前透過數位媒介建立的社群，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表態和行動。從前文提到戴爾這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來看，他之所以會碰到參與組織活動的阻礙，導因於在疫情期間所有的事情都轉往線上。因為他在社群媒體發佈的動態貼文被不認同其理念的親戚所看到，進而演變成他與父母之間的衝突。在那之後，他雖然改以創立另一個匿名帳號參與，在先前的經驗影響之下，他透過新帳號的參與變得比較是單向的觀看組織和組織成員在社群媒體上面的動向，使得組織成員難以確知他實際上的想法，甚至是其相應的行動為何。也因此，縱使後來戴爾偶爾仍會在「人民之子」的訊息群組裡分享加州菲裔社群寫作會的消息，他的參與明顯變得零碎也充滿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處境，「人民之子」的幹部變得開始要主動透過與個人聯繫與交流，否則很難確知這類型的人的確切動向。

正是基於像是妍森、戴爾這樣的例子，大多數「人民之子」的幹部都覺得線上做組織的效果並不是太理想，更加坐實他們認為實體交流更為穩定的想法。然而，在疫情趨緩、大多數活動重新轉往線下形式在籌辦之後，「人民之子」的幹部卻發現相似的問題依舊存在。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一度成為2022年至2023年夏威夷分會幹部在幾次幹部會議之中討論的重要課題。有些幹部會認為，這是因為大多數組織成員還尚未從疫情期間養成的模式回復過來，於是「萬人於社群響應，卻僅有小貓兩三隻到場」的情況層出不窮。但也有像是當

年度的副會長傑克這樣的人表示，這個問題顯示出「人民之子」組織工作的不足，應當要讓組織成員充分理解：重要的是人的參與構成了組織，這才有辦法讓組織的運作得以延續，否則空無人參與的組織什麼都不是。

透過上述疫情前後的對比，可以看到「人民之子」在內部關係維繫上面臨的挑戰，其關鍵並不僅僅在於是否使用數位行動主義從事組織動員。事實上，不論是前述的哪種經驗，數位媒介在社運實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在嘗試增進成員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因此，探討個人與組織之間互動關係的數位民族誌方法顯得尤為必要。這種方法可以揭示出菲律賓社運青年在強調線下實體組織動員工作時，可能容易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

（二）跨地域的組織串連

相較於維繫分會組織內關係的困境，「人民之子」藉由數位媒介在跨地域、跨組織的合作與網絡串連反倒是相對有所斬獲。原先美國總會通常是兩年才舉辦一次全國大會，藉此召集來自全國各地的分會成員在一個實體的地點聚會，共同討論並更新整體的運動策略以及議題設定方向。但當各分會因為疫情都漸漸習慣以線上視訊方式開會，再加上疫情期間碰上了菲律賓2022年的總統大選，總會為更有效的組織動員所有的分會，讓召集大家開會的頻率變得高上不少，而這樣的情況便使得總會與分會、分會與分會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關於理解「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跨地域串連的情況，我首先是透過加入到組織內部的教育討論委員會，進而於2021年開始跟著幹部參與美國總會針對負責組織教育討論的各分會代表而召開的線上視訊會議。在那些會議之中，絕大多數的時間是讓各分會在Zoom的分組會議室（Breakout room）分享與聆聽各自的經驗。其內容包括各分會如何規劃自己的教育討論，各自又如何因著組織既有的條件去調整自己教育討論的方式，還有他們如何依據各分會所處的地理位置或是主要會接觸的社群、部門發展出最適宜自己的在地化教育討論。此外，在我更積極參與到夏威夷分會的組織工作之後，很快地便留意到美國菲裔左派政治聯盟的「新愛國聯盟」美國總會（Bayan USA）每隔數個月還會邀請青年組織「人民之子」、移工團體「移工國際」（Migrante International）和

婦女組織「加布里埃拉婦女黨」(Gabriela) 等不同社運部門的各分會代表一同於線上組織大會。會議除了分享各部門當下主要經營的議題與推動的運動內容，更進一步商討跨部門相互聲援、合作的可能性。由於各分會本來於疫情影響下，在組織動員方面有著或大或小的衝擊，這樣的分享場合縱使無法直接解決各分會的組織困境，卻也無疑對它們有相當程度的功效。

前段提到的跨地域、跨組織線上串連，基本上還是鑲嵌於菲律賓左翼組織的階序化架構之中。另一方面，他們其實在疫情之前本來也就已經透過線上的電子郵件、社群媒體或活動響應等方式彼此串連。各地分會的組織經驗固然是在會議討論過程中的核心，他們也同時仰賴更高層級的總會組織它們共同溝通交流、發展超越地方議題論述的運動策略與合作可能。許多分會甚至藉由會議中的經驗分享作為靈感，回過頭去解決各自在地方上所面臨的難題。以2021年5月21日由美國總會召集的教育訓練大會為例，我在紀錄當日情況的田野筆記中寫到：「我們在分組討論要分享的第一個題目是：各分會如何決定教育討論該做些什麼？成員又怎麼樣透過這些規劃連結組織的運動目標？總的來說，大部分的與會者強調，他們在規劃教育討論的內容跟時程時，基本上會參照聯盟過往的經驗，即強調的重要紀念日或主題月，包含像是勞動節、婦女月、原住民族月和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紀念日等活動。」

與此同時，個別分會的成員還會強調各自在組織裡的做法：「來自舊金山的菲裔學生代表便在當時表示，尤其當這些日子所反映出來的議題是組織成員較不熟悉的時候，他們就會特別加強這方面的訓練。此外，有些分會也主張，他們的教育訓練內容會依照所欲結盟的目標而設計。加州聖荷西的代表便說明，他們為了想要用更積極的行動回應美國國內『停止仇恨亞裔』的運動，於是邀請了日裔組織分享離散社群的經驗和帝國主義的影響。而透過這樣的分享，他們不僅看見了日裔和菲裔社群共享的歷史因素，這也同時呼應了組織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評，這些都是有助於分會接下來結盟與行動的基礎。當夏威夷分會代表接著試圖分享自己的組織在地方是如何與原住民族和太平洋島民建立同盟關係的時候，我感覺到各分會在強調自己地方組織動員特點的同時，也無意間會嘗試與其他分會的想法及行動找到共通點，而這或許正是這種類型集會的重要目的。」(賴奕諭田野筆記，2021年5月21日)

由此看來，各地方分會最直接呼應總會的途徑，就是在特定節日或是主題月份的時候在各地籌劃共同主題的集會。有些分會或許會因為組成成員的特性或是地方的社會條件，自行再發展出各自的行動策略，但是透過總會將各分會統合起來的集會，又彷彿將各自開枝散葉的成果給重新整合起來。然而，這樣的跨地域串連並非疫情爆發之後才有的新現象，只不過多半是由原先實體活動的型態轉為線上形式而已。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這個奠基於左派政治聯盟框架之下的跨地域和跨組織串連，會相對穩固的於疫情期間持續發展。

當然，這並不表示疫情之中的跨地域和跨組織串連毫無新意。事實上，因為所有的活動於疫情期間都被迫轉為線上，這使得分會內部成員原先的人際網絡得以有機會延伸為社運網絡的一部分。在菲律賓人不斷藉由遷徙散佈全世界，並與菲律賓本土再連結的脈絡之下，這些經由「地方」分會所牽出來的人際網絡反而更呼應了菲律賓人在流動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

這裡特別列舉兩場由夏威夷分會在疫情期間舉辦的兩場線上論壇，分別是2020年4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座談會和2021年2月的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週年紀念論壇。前者以全球醫療產業鏈的角度切入，邀請來自紐約、夏威夷與菲律賓本土的醫療工作人員，讓他們分享各地的菲裔社群受疫情影響而面對什麼樣的難處。後者則以菲律賓與夏威夷之間的連結作為出發點，旨在討論前總統老馬可仕政權及其所實施的戒嚴如何影響兩地菲律賓社群的遷徙、互動與政治表態。這些社運青年在構思、籌劃並邀約講者的過程中，因為可以是線上活動的緣故，他們便試圖擺脫地域限制，以具體呈現出菲律賓社群在菲律賓、夏威夷與美國本土之間的互動網絡，又是怎麼樣凸顯出更具廣度的結構性社會問題。

前文提到，夏威夷分會嘗試因應在地條件，與夏威夷原住民族和太平洋島民的相關組織結盟。為了讓組織成員同時也對菲律賓的原住民族有所了解，幹部在2020年4月的時候鼓勵大家參加由科地雷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在線上舉辦的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紀念活動。科地雷拉日是菲律賓呂宋島北部行之有年的原住民族政治集會，除了紀念於1980年遭軍人射殺身亡的反水壩領袖Macli-ing Dulag，這個活動更是為了讓參與者得以藉由反思原住民族面臨的諸多困境，進而發展相應的行動與結盟的可能。由於夏威夷分會之中有幾個成員曾在美國總會的支持下，去過科地雷拉的地方組織見習，

他們算是又再透過這樣的線上活動與遠在菲律賓本土的社運友人重新搭上線。也是因為如此，「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在與菲律賓夏威夷人權委員會等相關組織的合作之下，於隔年開始自己在夏威夷舉辦科地雷拉日的紀念活動。

由此看來，跨地域組織串連的數位實作可以分為兩個面向討論。首先，「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本來就是跨地域政治聯盟的產物，菲律賓左派的政治聯盟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透過數位媒介進行溝通串連。也因此，彼此在疫情影響下的溝通與連結不至於困難，甚至因為降低了移動成本，使得總會與各分會間的集會頻率比疫情之前還要高。另一方面，基於人際關係而拓展的社運網絡反而是因為疫情的緣故，透過線上活動的串連為組織創造出新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則進一步成為了幹部探索出自己分會定位的契機。

（三）數位行動的侷限？

即便如此，對許多成員來說，以數位平台為媒介的組織行動還是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包含組織透過數位媒介維繫內部關係時候的困境，還有目標組織動員群眾可能會有數位落差的問題。有鑑於此，一些成員在疫情期間以個人的身份或是藉由組織參與到在夏威夷的物資發送或是家戶需求調查等計畫，強調在這樣特殊的時期更需要這樣線下的組織工作幫助到需要協助的民眾。也確實，當部分組織成員參與到檀香山一間聖公會教堂的物資放送計畫時，不少民眾會前來在領取物資之餘，順便帶著他們一家大小的手機與行動電源，希望能夠協助他們把電源給充滿。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確認民眾不會因為無法取得網路資訊而難以獲得相應的協助，組織成員得以進一步詢問他們的家庭或是勞動的狀況，並在現場就直接引薦相關的資源管道讓他們知道。

洋子 (Yoko) 是主要帶領「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成員參與聖公會教堂物資放送計畫的組織工作者。身為日裔美國人的她，早年先是在紐約接觸到亞裔美國人的政治倡議組織，接著才開始在菲律賓的人權倡議組織實習，也進而有機會到菲律賓的草根組織見習，前面提到的科地雷拉人民聯盟便是其中一例。在協助「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成立之後，她和其他幾位組織工作者在同年的5月於檀香山成立了夏威夷勞工中心，目的是為了協助當時直接受到疫情劇烈衝擊的觀光旅遊業底層勞工。雖然在疫情的限制下，中心的開幕活動只能夠在

線上舉行，中心成員卻考量到許多勞工可能在失業的情況下無法順利取得網路資源，仍堅持和地方的社福、宗教機構合作，提供線下的諮詢與援助服務。也因為洋子和「人民之子」成員的友好關係，一些組織成員便跟著一起加入到協助的行列。

當然，並不是所有成員都不擔心被肺炎傳染，就算是實際出走到戶外從事實體組織工作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他們冒著可能被感染的風險，也認為這是身為一個組織工作者應該要做的事情。羅倫斯就是其中一個形象鮮明的指標。他在疫情之初便留意到許多居住在夏威夷的密克羅尼西亞人在生計上陷入極大的困境，於是他便自告奮勇替地方政府為該社群做面對面的家戶調查，藉此理解居民的實際需求為何。不過也因為如此，他很快就確診新冠肺炎，成為在夏威夷相當早期就確診的人。然而，這並沒有成為阻礙他繼續行動的理由。在康復之後，他很快地又再加入了「人民之子」每週在聖公會教堂的活動，強調這才是實際上真的能夠幫助到人的作法，他們必須適度地承擔這樣的風險。

事實上，這些社運青年必須承擔的風險，還有包括在網路上所面對到的攻擊。除了在社群媒體上時常會面臨到的仇恨留言、親友的不諒解或是文章被迫下架等問題之外，分會有個成員維克在製作了一個迷因嘲諷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小馬可仕之後，因為該則迷因成為了臉書上的熱門動態，使他在接連數日收到上萬則私人訊息的攻擊。網路上還有一些人甚至循線肉搜到他遠在菲律賓的家人，同樣以私人訊息對他們進行一段時間的騷擾與威脅。

這些在社群媒體上可見的攻擊以外，就算是遠在菲律賓國境之外的夏威夷，也有一些人憂心政府或是私人公司可能會在社群媒體上暗自審查與監控。有位從菲律賓前來夏威夷讀書的成員便坦言，有些時候他會很擔心自己提到太過敏感的政治話題，也不確定這是否將可能影響到他以後回到菲律賓求職。因此，當疫情迫使組織大部分的對話與行動都轉往線上之際，有成員便直接提議改以加密的社群媒體取代臉書訊息。

有人在菲國的「反恐怖主義法」於2020年通過以後，在部分要批評政府的場合時，因為擔心可能遭竊聽、錄音甚至是定位的問題，而希望在場的大家可以將各種網路的連結給斷開。尤其杜特蒂政府於2020年4月下旬一度要求臺灣政府協助引渡一名在網路上批評菲國政府的菲籍移工，縱使最後這個要求並

未被臺灣政府給接受，這個新聞也讓部分身處海外的菲律賓人感到恐懼，包含「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成員也討論到這個案例和他們自己的關係。這樣恐懼的心情讓有些人確實便慢慢地淡出組織運作，不過也還是有人選擇面對種種的困難繼續留下來，繼續為他們內心相信菲律賓仍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努力著。

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做為人類學家的我逐漸具體地意識到：從事數位民族誌的研究不該只侷限在報導人於數位平台上的行動，反倒應該將線上與線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以這些社運青年在疫情中的數位實作來看，除了藉由他們將線下實體活動要轉成線上行動的過程，理解他們對於社會運動與數位媒介的看法與行動邏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意識到有些行動對他們而言反而是需要透過隱藏或中斷與數位媒介的連結才能夠做到，否則會有憂慮隨時遭到政府打壓的風險。即便他們的所處的位置和組織工作行動遠在海外，這些壓力也都還是真實地存在著。

如此看來，人類學家在參與、觀察到報導人的線上會議或是數位實作的過程，當然是得以藉此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但這也並不只是用以取代面對面的田野調查這麼單純而已。倘若未能夠把數位裝置、媒介及其與人們之間的互動關係給納入考量，那麼將無法真正釐清數位媒介、線上行動實際上究竟如何具體地滲入到人們的社會關係與日常實作，包含它們又是如何改變了人們在推動社會運動的行為模式。

五、社群媒體與菲律賓人共構而成的社群性

文章寫至目前為止，對於數位媒介以及行動主義的討論基本上是從一群菲律賓社運青年的實踐和觀察角度出發。即便數位媒介的使用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經是常態，但是疫情創造了一個極端且特殊的條件，讓他們重新思考是否所有的行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以轉化成以數位媒介為中介的關係。在疫情逐漸趨緩之後，除了分會與總會之間的線上集會，他們基本上放棄了大多數在疫情期間的數位實作嘗試。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人們厭倦了過去幾年以視訊為主的大量線上行動，而更關鍵的因素是他們認為數位行動再怎麼樣都不夠接地氣，也無法幫助組織工作者更進一步地建立人與人之

間穩固的社會關係。

然而，這樣的視角其實忽略了菲律賓人與數位媒介之間的互動關係早已經使其成為一種人機混合的賽伯格（cyborg），因為數位媒介早在他們思考數位行動主義之前便已經滲入到他們日常生活的關係之中。這也不是那些移動、遷徙至海外的菲律賓人為了要連結回自己母國的社會網絡才專屬的現象，就連身處於菲律賓本土的民眾也同樣是如此。

有鑑於此，本節首先試圖說明究竟是什麼樣條件造就了數位媒介、社群媒體等基礎建設成為菲律賓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種由數位所中介的社會關係又是如何具體地影響到他們的政治生活。藉由參與觀察「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在2022年菲律賓正副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的行動，本文接下來的內容嘗試釐清數位所中介的社會關係與社運青年在推動數位行動主義過程中的相互影響，並進一步追問為何數位行動主義始終無法受到菲律賓社運青年青睞的原因。

（一）數位所中介的社會關係

早從殖民時期開始，菲律賓便一直是全球勞務市場的重要人力輸出國，他們所代表的便宜人力也在二戰與冷戰期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重要勞動力來源。基於這樣的歷史淵源，菲律賓縱使在1946年之後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也一直都還是難以擺脫全球勞動力市場對他們的依賴。1970年代，時任總統的老馬可仕面對群眾對國內政治、經濟等條件不滿的聲音，遂以對抗勢力日趨壯大的共產黨叛軍與南部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者為由，宣佈實施最後長達九年的戒嚴（1972-1981）。

戒嚴期間，老馬可仕政府開始以具體政策大量向海外市場輸出勞動力，這不僅是為了藉由刺激經濟發展以穩固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秩序，老馬可仕也企圖透過賺取外匯以增加國家收入。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時政失望的菲國民眾來說，有些人面臨了要往深山（加入抗爭）或往海外工作的抉擇，而有更多不願涉入到如此對立政治氛圍的民眾選擇藉由這樣的機會離開故鄉，藉此為自己與家人追尋更美好的未來。因為這樣的脈絡，來自菲律賓的移工、移民便很快地遍佈到世界各地，至今有超過2千萬人在海外就業。

因為人民如此跨越國界的流動，伴隨著通訊技術與媒體的發展，讓數位媒介成為是構成近代菲律賓社會關係不容忽視的一環。也正是為了連結海內外菲律賓社群的需求，菲國早年曾一度有過「世界簡訊首都」的封號，直至今日也還是有「世界社群媒體首都」的稱號。根據社群媒體營銷公司We Are Social以及KEPIOS共同製作的*Digital 2022: The Philippines*（《2022菲律賓數位報告》，中譯名為作者自行翻譯）（Kemp 2022），這是因為菲國每人每日平均使用網路的時間超過十小時，而其中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更高達4小時9分鐘，位居世界榜首。從用戶的數據來看，菲國總人口數於2022年二月已達111,800,000人，但手機的註冊用戶數卻高達156,500,000，是總人口的140%。該國估計有92,050,000人為活躍的社群媒體使用者，其中用戶數量佔所有社群媒體第一位的臉書有83,850,000人次，不過倘若把臉書限定用戶必須大於13歲的規定給納入考量，可能所有可以註冊臉書的人幾乎都使用了它。

在菲律賓社會貧富差距落差甚大的情況下，臉書藉由與菲國電信公司合作的商業策略，讓民眾得以在成為特定電信公司用戶的前提下，得以每日獲得使用臉書的免費流量。不只是如此，不少民生用品也與臉書或是電信公司合作，推出消費即贈送流量等優惠的方案。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不少菲律賓人來說，臉書就等同於網路的同義詞，他們藉由臉書與海內外的親友聯繫並瞭解他們的近況與動向，他們甚至可能完全只會透過臉書獲取網路上的資訊而已，如此數位媒介的基礎建設影響了海內外菲律賓人使用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習慣。

有鑒於菲律賓人長時間、高頻率使用社群媒體的習慣，以「新愛國聯盟」美國總會為首的菲律賓左派政治聯盟於2022年菲律賓總統大選競選期間，首先在網路上成立了「社群媒體素材共享」群組（Social Media Prop Share）。在這個由總會幹部群和各分會社群媒體素材負責人組成的群組中，他們透過集中管理的雲端資料夾，分享總會和各區域分會製作的聲明、影片、圖片與圖表，同時也包括當下熱門的新聞素材作為靈感來源。雖然當時在疫情逐漸趨緩的美國社會中，線下實體的組織動員已經開始重新回到街頭，成為這些菲律賓社運青年偏好選擇的行動之一；然而，透過帶動社群媒體上的話題討論，進而試圖影響已由數位所中介而構成的社會關係，也是這場選戰中不容忽視的面向之一。

即便並非在菲律賓境內，夏威夷卻是一個值得我們考究本土與離散社群如何透過數位媒介維繫關係的重要地點。早在20世紀初期，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伊洛卡諾人便在「夏威夷種植園主協會」（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簡稱HSPA）的招募下陸續前往夏威夷擔任種植園契約工。當時為了確保穩定的勞動力來源，種植園主不僅鼓勵勞工多多寫信回家，講述夏威夷的美好生活，還提供契約期滿勞工返鄉所需的交通費，使得許多菲律賓人在20世紀上半葉便不斷地在菲律賓與夏威夷之間往返（Poblete 2014: 49）。1965年之後的美國，雖然開始透過修正移民法限制移民數量，但以伊洛卡諾人為主的菲律賓人仍不斷以家庭團聚為由，持續遷徙至夏威夷。值得注意的是，夏威夷的菲裔居民即使無法再像殖民時期那樣毫無限制地往返兩地，許多在夏威夷退休的人卻又再搬回菲律賓享受退休生活。因此，兩地之間直至今日不僅仍然持續有人群互相流動，彼此之間透過社群媒體和數位媒介的聯繫也依舊相當頻繁。

「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組織動員工作很難無視這樣的社會條件，特別是在2022年菲律賓正副總統大選期間。一方面，美國的「新愛國聯盟」和「人民之子」都希望能夠積極組織和動員在美的菲人社群，藉此帶動其他國家政府或個人對菲國大選的關注，進而形成能夠影響菲律賓國內輿論和選情的壓力。尤其是被稱為前獨裁者之子的小馬可仕，在當年的總統選舉中來勢洶洶，從一開始選情便氣勢驚人。另一方面，受菲律賓不在籍與海外投票規定的影響，僅在夏威夷註冊的投票人口就超過8,500人。這或許不是能夠撼動選情的數字，但夏威夷卻是相當具指標性的海外投票點。這是因為普遍認為以伊洛卡諾人為主的夏威夷菲裔社群，多半會因為同鄉情誼而支持曾在菲國實施獨裁戒嚴的前總統馬可仕及其子小馬可仕。為了挑戰這樣的刻板印象並扭轉在夏威夷的投票結果，「人民之子」成員從投票日的前一年便已開始與其他持相似立場的菲裔組織商討如何組織和動員。如此看來，不論是線上或線下的行動，「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目標的組織動員群眾主要是夏威夷的菲裔社群。幸運的話，可能甚至包括這個社群所能延伸並連結到的菲律賓本土伊洛卡諾社群。

(二) 數位媒介影響下的政治生活

為了讓各地區分會在參與選戰和組織動員的策略上達成共識，「新愛國聯盟」及其他左派政治聯盟的成員組織自2021年下半年開始，便每月舉行一次線上集會，討論參與競選活動的計劃並安排相關的教育訓練。根據當時所留下的會議紀錄，菲律賓海內外的競選活動雖然直至2022年2月才會正式開始，但總會早在前一年的9月便已寄送競選期程計劃，並試圖向各分會招募有意加入「社群媒體素材共享」群組的人選。而在同年10月的線上集會中，總會安排了講者分析各政治陣營如何看待即將到來的大選，並探討左派聯盟應如何制定立場與行動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各分會的代表能夠將這些討論帶回地方，開始與組織成員分享並進行交流。

在這樣的結盟關係中，「人民之子」在競選期間主要負責在線上向群眾宣傳的組織工作。為此，美國總會於2月中旬首先舉辦了一場訓練工作坊，強調所有規劃的核心目標是藉由激起群眾響應的行動，將其轉化為最高層次的政治宣傳手段。除了素材的生產和討論，技術方面的考量也值得關注。例如，在選前一個月的線上集會中，不少分會代表根據過去幾個月的經驗，強調應在最後關頭將重心放在大多數菲律賓人都會使用的臉書，並且在素材規格和內容設計上考量到大多數人是用手機瀏覽社群媒體。另一個被討論的重要議題是，這些素材到底應該由各組織的粉絲專頁分享，還是由組織成員個人帳號分享。有些與會者表示，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讓他們在組織粉絲專頁上所分享的素材無法有效推播出去，即使製作再多宣傳素材也可能沒有什麼效果。為應對這一問題，組織採取的做法是讓個人在分享素材時標記組織的粉絲專頁，然後再由組織轉發這些個人所發佈的內容。

在競選期間，「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成員其實沒有像之前那樣積極參與總會的線上集會，反而花更多時間與在地的其他菲裔組織共同籌劃實體的組織動員活動。因此，從2022年2月開始，這些菲律賓社運青年每週都在夏威夷的不同角落與其他組織成員一起奔波。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完全沒有進行線上行動。個人帳號針對活動參與的分享是大多數時候的途徑。而從組織的社群帳號來看，他們在競選期間多半分享夏威夷其他菲律賓組織舉辦活動的貼文。更多時候，他們是在參與活動的當下分享限時動態，鼓勵即時看到的專頁追蹤

者一同出門共襄盛舉。不過整體而言，「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的成員在社群媒體的操作上並不算活躍。

相較於線下實體活動，不少菲律賓社運青年對數位行動主義抱持著遲疑態度，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數位實作往往難以延續人與人之間的後續互動。由於貼文有時候不見得會有回應，使得他們無法確定資訊是否被接收到，以及接收資訊後的反應為何。相較之下，限時動態的分享反而還能夠看到有哪些人看過內容，就算一樣是沒有回應，至少可以稍微推敲大家的態度。不過倘若從菲律賓人彼此之間在社群媒體上這麼緊密的關係來看，藉由發文、按讚、分享、加好友、追蹤專頁等行動用以作為政治表態的方式確實會是種壓力，這個壓力甚至可能就是來自於與他們在社群媒體有連結的親友。尤其在夏威夷這樣的地方，許多菲裔居民都是伊洛卡諾人，他們支持小馬可仕並對左派運動路線有所疑慮。在這樣的關係網絡中表達與他們不同的立場，原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便是那些從菲律賓來到夏威夷讀書的青年，在他們因為日常生活與當地社群逐漸產生連結後，再嘗試用特定的政治立場去說服、影響這些人時，多少都會遇到困難。

這樣的說法其來有自，有些時候甚至源自於這些社運青年自己的經驗。比如幼時便隨著父母搬到夏威夷定居的大學生組織成員佳明，在競選期間因參加反小馬可仕的集會，與父母發生了極大的衝突。除了日常對話中的爭執，她在社群媒體上的發文也成為彼此爭執的理由。組織裡還有其他的青年，儘管在組織聚會中積極熱切地討論各種社會議題，但幾乎不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佈任何與政治相關的訊息。也有另外一種人，他們大多數的貼文都與社會運動相關，但即使是組織成員也很少會與這些貼文互動。然而，即便這些人看似沒有在網路上互動，但在聚會時提到這些發文內容時，會發現其實他們多半都讀過那些貼文，只是沒有在社群媒體上互動而已。從我們想像中人與人之間互動方式的角度來看，這些互動並無法被看見，卻並不代表互動並不存在。人們藉由數位媒介隱身於背後而形成的（不）互動，使得人與數位媒介構成一個科技混合物並不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事實上，這也不是這群菲律賓社運青年的數位實踐才形成的獨特現象。McKay（2019）以菲律賓左翼運動者嘗試要組織動員海外移工社群的研

究為例，主張離散菲律賓人的社群媒體形成了一個「環境監測」（ambient surveillance）的場域。該場域讓組織工作者得以藉由關心移工的動態，而以照顧作為他們期望對方能夠在之後一起被政治動員的手段。McKay同時以那些並未選擇加入政治動員行列的移工為研究對象，說明他們也同樣透過這樣的場域觀察組織工作者。就算並不是反對左派的運動理念及策略，那些移工也可以藉由在社群媒體上的觀望、等待或不作為等手段來部署屬於自己的在社群媒體現身或隱身的策略。

有鑑於此，數位行動主義所面對的困境，已經不僅僅是「鍵擊行動主義」（clicktivism）這種被許多人認為是消極的社會運動形式而已。以這群菲律賓社運青年的數位實踐經驗來說，他們多半認為其困境還涉及如何在數位平台上建立真正有意義的互動，並持續推動社會運動的長期發展。事實上，我們也從他們的數位實踐中了解到，這些困境牽涉到我們是否能夠理解數位媒介中介之下形塑而成的社會關係，使得一些隱身、觀望、等待或不作為等互動過程變得不易察覺。由此可知，數位行動主義的挑戰不僅在於行動本身的形式和策略，還在於如何在數位空間中捕捉和理解這些細微且複雜的社會互動。

（三）國家與資本力量共謀之下的壓迫？

當然，在提到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的困境時，還有另一個不得不提的面向是國家的壓迫。許多人在談到數位行動主義在菲律賓所面對的挑戰時，往往強調因為是國家與科技公司掌控著實踐數位行動主義最關鍵的數位基礎設施，使得數位行動只能夠作為加強或補足面對面組織動員的途徑之一。這樣的說法背後其實預設了國家與資本力量的共謀，使得國家得以藉由數位基礎設施將其安全部署延伸至虛擬空間與國界之外，並藉由監控等手段窺伺、騷擾或打壓異議人士。

近年來有許多跨國的調查報告皆強化了這樣的觀點，因為它們不約而同地指出：各國政府在更加了解他們的國民於網路上的行動之後，也往往開始有越來越多於社群媒體上相應的監控行為。社群媒體研究者吉莉安·約克（2022: 66）便主張，自2010年代以降，政府和各社群平台的幕後合作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這樣的夥伴關係往往以黑箱且不負責任的手段共同對付相對弱勢的敵人。

在菲律賓，瑪麗亞·瑞薩（2023: 203-205）也觀察到該國的政治人物於2010年代中期開始，藉由更為商業化的模式在網路上發展全新的傳播訊息技巧，也就是透過散播負面訊息和謊言來煽動恐懼。

這樣的情況搭配著海內外菲律賓人高比例、高頻率的使用社群媒體，再加上數位裝置的定位、演算法藉由快速感知到人的移動與可能感興趣的議題來推播相應內容，營造出一種人們可能隨時被監控的氛圍，使得人們相信國家的手已經伸入到網路的虛擬空間之中。有些「人民之子」的成員就提到，他們或許就只是在線下的日常對話提及特定事物，但是社群媒體可能很快地便會向他們推播相關的資訊或廣告。此外，隨著人與其數位裝置的物理移動，社群媒體或是應用程式也會跟著這些移動感知「地方」，進而調整其呈現的內容。這些就算不見得真的有國家的手在背後操控，他們也往往會因為演算法得以這麼快速且準確的做出判斷，憂心跟自己相關的資料會被外洩。這也就讓社運青年對線上的行動感到遲疑和退卻，其影響的範圍甚至擴及至國家疆界之外的離散社群。

事實上也不用特別提到別人，同時身為研究者與組織參與成員的我，在使用社群媒體的過程中也同樣親身經歷到這樣的情況，因為我自己的個人社群媒體頁面便成了這些菲律賓社運青年觀看的目標。我便曾經被問到，在臉書加了這麼多組織工作者的好友，並且追蹤不少政治敏感的人物與粉絲專頁之後，是否會擔心做田野調查的時候被特別關注。此外，我在開始於自己的頁面書寫對於菲律賓社運的觀察之後，即便是中文的書寫他們也會透過網頁的翻譯功能閱讀，有人甚至曾經再私訊我應該要修正某些敏感內容。

然而，本文嘗試在人們此般憂慮心情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指出，這種由社群媒體與菲律賓人共同生成的社群性條件，其實並不見得是特定行動者的具體政治意圖所造就的結果。社群媒體之所以能夠深刻的滲入到菲律賓人的社會關係之中，其實是透過人、數位裝置與社群媒體不斷彼此互動而來的產物。也因此，當政治力量試圖要介入這個網絡的時候，往往受到其中不同行動者的阻撓或是彼此之間不同調的行動影響，其實並無法輕而易舉地就主導這樣由多個行動者所構成的異質網絡。

舉例來說，研究菲律賓假資訊及網軍產業的Ong和Cabañes（2019: 5779-5780）主張，假資訊的生產及其在菲律賓社群的效果，往往是奠基於網紅、數位工作者及廣告公關公司相互合作與競爭的關係上。同一個政治人物同時有許多不同的內容生產者協助。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內容並不會是一致的，其政治效果也不見得是出資者一開始所預期的。顯示當國家嘗試要藉由介入社群媒體的內容生產以操縱政治力量的時候，因為政治計畫本身就是有多個不同的行動者在分頭進行，它或許達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效果，其發展方向與結果卻可能往往是難以預期的。

即便如此，菲律賓社運青年在網路上所面臨的威脅和攻擊卻也是無法忽視且真實存在的現象。例如，前文提到的維克遭到網友肉搜的情況，以及「人民之子」夏威夷分會其他成員在競選期間以個人帳號分享評論後，遭到四面八方酸民攻擊的情形。此外，在「新愛國聯盟」的線上集會中，也不時提到網軍和杜特蒂、小馬可仕的支持者在網路上流竄，攻擊其他異議人士的狀況。在安全或是降低溝通成本等考量之下，這些經驗不僅形塑了菲律賓社運青年對數位行動主義遲疑的態度，也使得他們和他們所欲組織動員的對象，開始發展出在社群媒體現身與隱身的策略，甚至選擇在特定時刻斷開與數位媒介的連結。正是因為人與數位媒介已經成為密不可分的一體，於數位媒介上頭顯示出來的不作為並不代表不在場或是不存在。同理可證，在社群媒體上面不選擇做政治表態，它可能本身也是非常政治的一件事。

從前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理解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的發展之前，首要的一步是深入了解數位媒介和社群媒體與菲律賓人共同創造的社群性條件。由於數位媒介的普及已經深入到菲律賓人的社會關係和日常生活中，這種情境為組織工作者提供了可能性，使他們能夠在線上建立跨地域、跨組織的聯繫，進而為各地的線下組織工作奠定基礎。然而，這樣的社群條件所構建出來的菲律賓社會網絡並不一定是一個同質的政治社群。這也使得那些試圖介入並影響該社群的組織工作者面臨許多挑戰。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在社群平台上進行政治表達，可能會感受到不小的壓力。這種壓力或許來自於他們在社群媒體上與親友建立的聯繫，甚至可能來自於（他們想像的）國家壓迫力量。因此，了解這樣的社群性條件和壓力背後的因素，對於理解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的脈絡和發展

至關重要。這些不僅僅影響了人們在使用數位媒介和社群媒體時候的考量，也是他們在發展各種（不）行動策略的重要基礎。

六、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後人類政治的視角

本文企圖透過數位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後人類政治的觀點，檢視菲律賓數位行動主義的發展以及菲律賓社運青年身處於其中的數位實作。過程中，本研究重新反思菲律賓社運人士為何對數位行動主義的運用感到遲疑的理由，主張不應該把數位行動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單純理解為政府和社運人士於線下的行動與對立之延伸。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將焦點放在不僅僅是人類，也包括技術、社群媒體平台以及其他非人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這種觀點挑戰了傳統政治分析的人類中心主義，將注意力轉向數位技術、虛擬網絡和人類之間的交互作用。

簡言之，數位行動主義的發展不僅僅是人們使用數位媒介和社群媒體來組織政治行動，更涉及到如何整合人與技術、人與虛擬網絡之間的互動。這些技術和媒體不能只被當作是工具，因為它們還能塑造和改變社會運動的形式和影響，同時也得以在政府治理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鑑於此，我們必須理解數位媒介、社群平台在菲律賓中介、形塑社會關係的過程，其中除了菲律賓人之間的關係，還包括組織工作者與參與者之間的連結，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數位媒介透過即時互動、訊息分享等方式，改變了這些關係的運作方式，創造、鞏固或強化社會中不同角色之間的相互影響。

此外，由於社會關係是透過數位媒介所建立的，許多由非人類行為者引起的影響可能會讓人們誤解為他人的意圖，進而影響人們日後的行動和互動。這種情況在數位環境中特別顯著，因為訊息的流通和影響往往來自於複雜的互動網絡，包括自動演算法、機器人，甚至是虛擬實體。這種誤解甚至可能導致人們對於特定事件、政治主張或社會運動的看法和行動產生差異。最明顯也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就是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即便大家都曾聽聞政府、社群平台和廣告公關公司之間的共謀，但是國家實際上監控或打壓異議者的行動是什麼卻一直是件撲朔迷離的事情。如前文所述，數位媒介和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及

其運作特性卻容易讓人感受到國家可能的壓力、放大恐懼的情緒。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菲律賓的組織工作者會開始思考該如何透過中斷數位的連結來預防國家的壓迫，就算實際上不見得真是國家的力量涉入的部分。

另一方面，社群平台除了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透過裝置與演算法給緊密連結在一塊，它也同時提供了使用者在數位媒介背後隱身的可能性，使其得以基於自身的各種考量而選擇不直接表態。這裡我嘗試要強調的是，這些中斷數位連結或隱身的手段不盡然就是消極的作為，反倒可能是藉由抗拒透過數位媒介塑造而成的既存社會關係，進而創造出人們與他者之間新的「互動」模式，即便對方不見得能夠在數位實作的過程中意識到這樣的「互動」存在。然而，也正是在這樣數位技術、虛擬網絡和人類間的交互作用之下，組織工作者時常容易感到線上做組織的過程實在是困難重重。與此同時，研究者若是無法掌握到線上、線上行動相互影響的情形，也難以真正洞悉行動者在其中的作為，遑論後續可能再陸續發展出來的政治行動。

有賴於過去我在菲律賓的田野調查經驗，使得我在參與到離散社群的菲律賓青年組織動員行動時，能夠理解到數位行動主義及其相對應的反制舉措，究竟是如何也同時具體地在菲律賓國界之外形成不容忽視的力量。在本土和海外的勢力透過數位媒介的連結不斷相互作用且影響的過程中，本文試圖釐清到底什麼是屬於菲律賓政治場域之中的行動者。這些行動者可能具有不同的動機、目標和策略，但他們都在共同的虛擬環境中交互作用，進一步凸顯了菲律賓政治場域中不同行動者的複雜性。最終，隨著進入到數位時代，我們必須了解到政治的定義和形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數位技術與數位行動主義的發展將繼續影響著菲律賓的政治走向，並引領著未來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行動。而本文所強調的數位民族誌方法切入點，希望能夠激發研究政治與行動主義的人類學家更多對研究的想像，藉由這樣的後人類政治視角，捕捉到更幽微且平時難以察覺的社會互動，並推進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解可能。

參考書目

Ressa, Maria 瑪麗亞·瑞薩

2023 [2022] 向獨裁者說不：諾貝爾和平獎記者如何捍衛民主底線，為我們

的未來奮鬥 [How to Stand Up to a Dictator: The Fight for Our Future], 葉佳怡譯 [Yeh, Chia-yi, trans.]. 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New Taipei City: Commercial Press].

York, Jillian 吉莉安·約克

2022 [2020] 矽谷價值戰：監控資本主義之下言論自由的未來 [Silicon Values: The Future of Free Speech Und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黃開譯 [Kai Huang, trans.]. 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Taipei: Flâneur Culture Lab].

Anakbayan-USA NEC

2021 Anakbayan-USA PADEPA Memo + Curriculum 202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rguelles, Cleve V.

2020 Apathetic Millennials? The Personal Politics of Today's Young People. *In* Rethinking Filipino Millennial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a Misunderstood Generation. Jayeel S. Cornelio, ed. Pp. 41-63. Manila: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Publishing House.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raidotti, Rosi

2016 Posthuman Affirmative Politics. *In* Resisting Biopolitics: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and Performative Strategies. S. E. Wilmer and Audrone Zukauskaite, eds. Pp. 30-56. New York: Routledge.

Castells, Manuel

2015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2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ombinido, Pamela and Nicole Curato

2021 Curing "Patient Zero": Reclaiming the Digital Public Sphere in the Philippines. *In* From Grassroots Activism to Disinformation: Social Media in Southeast Asia. Aim Sinpeng and Ross Tapsell, eds. Pp. 33-63.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Education Department

2020 Activist Study: Araling Aktibist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Dalgas, Karina Märcher

2016 Au Pairs on Facebook: Ethnographic Use of Social Media in Politicised Fields. *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 6(3): 175-182.

David, Clarissa

2013 ICTs in Political Engagement among Youth in the Philippin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5(3): 322-337.

- Downey, Gary Lee, Joseph Dumit and Sarah Williams
1995 Cyborg Anthrop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2): 264-269.
- Earl, Jennifer and Katrina Kimport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Estella, Pauline Gidget
2021 Digital Populism, Digital Newswork and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Competence: The Philippine Condition.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79(1): 80-95.
- Fishel, Stefanie R.
2017 *The Microbial State: Global Thriving and the Body Politi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erbaudo, Paolo
2012 *Tweets and the Street: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London: Pluto Press.
- Guerrero, Amado
1971 *Philippin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Manila: Pulang Tala Publication.
- Horst, Heather and Daniel Miller
2012 Normativity and Materiality: A View from Digital Anthropology.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45: 103-111.
- Juris, Jeffrey S.
2012 Digitality and Socio-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George Ritzer, ed. Pp. 438-441. Malden: Wiley-Blackwell.
- Kemp, Simon
2022 *Digital 2022: The Philippine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philippines>. Accessed September 8, 2022.
- Kidd, Dustin and Keith McIntosh
2016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y Compass* 10/9 (2016): 785-794.
- Lanuza, Gerry
2015 Reactivating Filipino Youth Activism in the Age of Slacktivism. *Plaridel* 12(1): 97-122.
- Law, Lisa
2003 Transnational Cyberpublics: New Political Spaces for Labour Migrants in A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2): 234-252.
- Lim, Merlyna
2014 Seeing Spatially: People, Networks and Movements in Digital and Urban Spac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6(1): 51-72.
- Marcaida, Marielle

- 2020 Student Activism Offline and Online: A Mixed-Methods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Protest Particip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Review* 72(1): 1-22.
- McKay, Deirdre
2019 Ambient Surveillance: How Care-for-Control Emerges across Diasporic Social Media. *Ethnos* 85(2): 309-326.
- Ong, Jonathan Corpus and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2019 When Disinformation Studies Meets Production Studies: Social Identities and Moral Justifications in the Political Troll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2019): 5771-5790.
- Poblete, JoAnna
2014 *Islanders in the Empire: Filipino and Puerto Rican Laborers in Hawa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rasad, Pritha
2016 Beyond Rights as Recognition: Black Twitter and Posthuman Coalitional Possibilities. *Prose Studies* 38(1): 50-73.
- Sales, Joy N.
2019 #NeverAgainToMartialLaw: Transnational Filipino American Activism in the Shadow of Marcos and Age of Duterte. *Amerasia Journal* 45(3): 299-315.
- Smart, Alan and Josephine Smart
2017 *Posthumanism: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Turner, Terence
1992 Defiant Images: The Kayapo Appropriation of Video. *Anthropology Today* 8(6): 5-16.

賴奕諭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424 Maile Way, Saunders Hall 346, Honolulu, Hawaii, USA 96822
yiyulai@hawaii.edu

Exploring Online Organizing Possibilities:

Digital Practices among Filipino Youth and Their Moving-in-between Bodies

Yi-yu Lai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Ph.D. Candidate*

T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it is evident that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facilitating and shaping social movements. However, despite the pivotal roles played by radio and mobile phones during the People Power Revolutions of 1986 and 2001, grassroots organizers have maintained a cautious stance towards the increasing ubiquity of social media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Filipinos. They argue that digital activism has not truly replaced traditional forms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Furthermore, they assert tha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been infiltrated by state-sponsored violence, serving as a substantial channe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disinformation and the vilification of activist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igital ethnography that explores the interplay of digital practices among Filipino youth activis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focuses on their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efforts, which facilitated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and diasporic communities, within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Philippine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ir hesitancy towards embracing digital activism, given its evident potential. The study's approach extends to exploring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realms, as well as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dynamics. With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a posthuman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at has arisen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digital practices and activism. It highlights the possibility of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human-centered politics. Additionally, it seeks to offer the new horizons that 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can explore through the study of digital ethnography, which involve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formed between humans, digital devices, and virtual networks.

This research sheds lights on the conditions created by digital devices, social media, and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Filipino people. The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have given rise to distinct action strategies that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digital practices and activism within and beyond the Philippine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at digital ethn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should view online and offline actions as integrated components, so that researcher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and distinctions behind individuals' choices to manifest or conceal themselves within social media.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cknowledge and analyze the roles of non-human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who continually traverse national boundaries. These actors, who might not be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as participants in the broader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nevertheless wield significant influe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activism. This expanded perspective underscores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digital age, where non-human agents, such as algorithms and automated bots, can shape and manipulate public discourse, further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ynamics.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faceted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Philippines, focusing on the evolving role of digital activism,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state-sponsored disinformation. It underscores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digital ethnography in unraveling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digital and physical realms and the dynamics of posthuman politics. T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e broader discourse on the intersection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activism, social media, diaspora, posthuman politics, Philippines
